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从中国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是“飞来峰”,而是有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开创了人民民主的新时代;从世界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超越了西方单过程选民主,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形态。全面深入阐释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学科发展、学术进步、话语创新的必然要求。本期“全过程人民民主”专题从历史逻辑、比较视野、实践场域角度,呈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话语建构历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超越性和引领性以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用性和适用性。

——特约召集人 王炳权

##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民民主话语结构的流变

彭冲<sup>1</sup>,王炳权<sup>2</sup>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北京 102488; 2.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

**摘要:**人民民主话语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和维护人民当家作主而使用的一系列话语叙事。人民民主话语结构体现为目标与策略、价值与实践的统一,它的内在流变源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民主话语目标指向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策略指向发挥人民民主的动员功能、动态调整革命依靠的力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人民民主话语目标指向巩固新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策略指向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人民民主话语目标指向继续围绕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展开,策略指向坚持民主与集中、民主与法治的统一,探索中国式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民主话语目标指向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策略指向发扬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走好线上线下群众路线、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把握人民民主话语结构的流变,有利于理解中国式民主的丰富内涵,以及民主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深刻意蕴。

**关键词:**人民民主;民主集中制;基层民主;协商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

中图分类号: D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194(2022)02-0039-12

DOI:10.16501/j.cnki.50-1019/d.2022.02.007

### 1 问题提出与文献述评

2021年10月,习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指出,“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sup>[1]</sup>,并强调要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发挥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随后发布的《中国的民主》白皮书指出,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民主形态,中国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它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改革、发展实践探索的结果,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人民利益。中国的人民民主是广泛、真实、管用的民主,它不仅推动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还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形态<sup>[2]</sup>。人民民主话语作为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政治表达,是有关民主目标与策略、价值与实践相统一的语言叙事。目前关于人民民主话语的研究主要聚焦领导人的人民民主话语及其实践形式两个方面。比如,

收稿日期: 2022-01-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论述研究”(21&ZD006),项目负责人: 王炳权。

作者简介: 彭冲(1993—),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王炳权(1972—),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有学者研究毛泽东的人民民主话语,分析其表述变化背后的政治考量<sup>[3]</sup>;研究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人民民主话语,发现“发展”是共享词汇<sup>[4]</sup>;研究改革开放以来,选举民主、基层民主、协商民主以及网络民主等人民民主话语的实践形式<sup>[5]</sup>;也有学者研究20世纪中国共产党从找到民主新路到推进依法治国的探索历程<sup>[6]</sup>。此外,作为新时代人民民主的新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广受关注,不少学者探索其理论形态<sup>[7]</sup>、传统资源<sup>[8]</sup>、实践形式<sup>[9]</sup>,试图进一步充实人民民主话语的理论内涵。这些理论成果为研究人民民主奠定了基础,但总体上断代史叙述居多,人民民主话语特征提炼较少,对百年来人民民主话语结构流变把握不够。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sup>[10]</sup>。曼海姆指出,话语是思想的载体,有明确指向性,它反映了说话人的立场,受到历史环境影响<sup>[11]5-11</sup>。福柯强调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社会中存在为了话语及用话语而进行的斗争,话语是必须被控制的力量<sup>[12]3</sup>。费尔克拉夫突出话语的多功能属性,即话语不仅反映和描述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还建构或“构成”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他尝试从文本、话语实践、社会实践三个向度分析话语与社会的互动关系<sup>[13]3</sup>。弗里登关注话语的结构,把话语分为“核心—相邻—外围”三层,认为话语结构随时空环境变化而变化,曾处于话语结构核心的表达随时空环境变化可能会被边缘化,话语从核心到边缘也体现为从抽象到具体的关系<sup>[14]61-62</sup>。这些思想家有关话语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表明:话语与社会相互作用,社会决定了话语,话语的变化反映并作用于社会的变化;话语反映权力关系、实现意义的传达;话语结构存在时空差异性,言说者或书写者通过核心词、句子表达的变化传递不同的目标指向以及相应的策略。人民民主话语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和维护人民当家作主而使用的一系列语言叙事,它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话语表达形式,具体体现为目标与策略、价值与实践的统一。为充分理解人民民主内涵,有必要将其话语结构流变和社会环境的变迁联系起来。

具体而言,将人民民主话语结构的流变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考察更具科学性。这一历史分期来源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它准确界定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人民民主作为中国共产党各时期的共同话语,揭示其结构在时间序列上的区别和联系对于深刻认识人民民主具有重要意义(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基于对“三座大山”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中日民族矛盾的把握,根据革命形势变化,不断调整人民民主话语表达策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处于革命向建设过渡期,人民民主话语服务于巩固新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策略表达体现出开创性和探索性特征,比如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大民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基于对上一历史时期的反思和总结,人民民主话语在继续围绕建设国家的目标基础上,在策略表达方面体现为坚持民主与集中、民主与法治的统一、探索中国式民主等;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基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人民民主话语内涵更加丰富,取各历史时期人民民主话语表达之精华,结合实践需要不断充实内涵,比如目标上指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策略上包括发扬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走好线上线下群众路线、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

表 1 中国共产党人民民主话语结构的流变

历史分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社会主要矛盾	“三座大山”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中日民族矛盾	“三座大山”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长期目标	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人民民主话语	核心目标	革命建国	巩固政权	建设国家	治理国家
	主要策略	民主革命依靠力量是变化的;以阶级分析看待人民民主;重视人民民主的动员功能	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推进社会主义大民主	继承和发扬民主集中制;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形成“三统一”治国方针;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发扬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走好线上线下群众路线;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

## 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人民民主话语

中国共产党人民民主话语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话语的继承和发展,是适应中国革命实际的创造性提法。“人民民主”一词虽于 1936 年才正式提出,即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提出,“苏维埃政府赞成建立这样一个统一的人民民主政府的理由也即在此”<sup>[15]306</sup>。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较早阶段诸如“无产阶级专政”“工农民主政权”“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等提法与“人民民主专政”内涵接近,“中央认为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本无实质上的区别”<sup>[16]682</sup>。不同之处在于不同时期的表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所依靠的革命力量的构成有差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人民民主话语基于对“三座大山”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中日民族矛盾的认知,服务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建国的历史使命。

一是要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宣告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解释,社会主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人民群众致力于发展生产力,消除剥削压迫,消灭私有制,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奋进。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抱着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实现劳苦大众翻身作主、实现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理想,这是“人民民主”的朴素表达。事实上,20 世纪初,建立新中国是各种进步力量的第一要务,宋教仁试图通过组党造党形式统一全国、建立民主政权;孙中山试图通过少数人革命推翻反动统治,最后认识到“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sup>[17]1128</sup>,才能建立民主共和国。但实践证明,资产阶级民主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共产党人受十月革命的影响,接受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实现多数人的民主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因为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西方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是旧式民主,是建立在少数人对广大无产阶级剥削压迫之上的民主,是“吃人政治”<sup>[18]736</sup>。经过 28 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这标志着建立人民民主国家的理想转化为现实,人民从此不再受到剥削压迫,都享有了平等的权利。所

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民主话语的核心目标指向革命建国,要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二是民主革命依靠力量是变化的。受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影响,早期中国共产党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依靠力量是工业无产阶级,革命就是通过发动城市工人去夺取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现在做城市工人工作还忙不过来,哪有空去做乡村工作”<sup>[19]179</sup>。工人罢工虽然取得不少胜利,但面对军阀打压、帝国主义压迫,工人运动走向低潮,另寻革命道路迫在眉睫。毛泽东通过对革命形势的分析和对革命实践的反思,逐步认识到需要发挥农民的力量,总结出“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此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重心转向了农村,开辟了“乡村工农民主政权”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实现农民翻身作主,动员农民参加革命,革命依靠力量转向城市工人和广大被压迫的农民阶级,革命政权实行“工人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它对于工农是广大的民主,但绝不容许有任何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参加”<sup>[20]67</sup>。随着中日民族矛盾日渐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民主和抗日联系在一起。1937年5月,毛泽东指出,新阶段的任务是争取民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民主也不行,“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sup>[21]255</sup>。基于实现民族独立必然性、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民主革命的依靠力量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一切爱国人士。针对抗日形势好转,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倾向愈发明显,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民主、统一”口号,呼吁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在此期间,“人民民主”也逐渐成为固定表达,频繁出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讲话中,民主革命的依靠力量泛指一切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综上可知,中国共产党对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依靠力量的认识是随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以及革命形势变化而变化的,这体现了人民民主话语表达的策略性和灵活性,意在团结多数人力量的夺取革命胜利。

三是以阶级分析看待人民民主。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历史呈现出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自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传统,用阶级分析法来把握革命形势、认识人民民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认为人民大众受到“三座大山”压迫,无产阶级需要领导革命力量实现革命胜利,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而无产阶级之所以是领导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力量,是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sup>[22]1479</sup>。无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自身孕育的掘墓人,是新社会的专政力量,因此要意识到民主与专政的统一,“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sup>[22]1475</sup>。如果人民民主抛弃阶级专政,可能会导致反动力量的反扑,人民大众再次面临被压迫剥削的境地。

四是重视人民民主的动员功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高举“人民民主”旗帜有利于团结和动员广大群众,进而推动革命进程,“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sup>[20]202</sup>。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充分发挥了民主的动员功能,比如发扬民主、解放农民、开展土地革命,获得农民支持;抗日战争时期在革命根据地实行“三三制”,开展减租减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争取各阶级的支持;团结国内一切进步力量,组成“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瓦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面对国民党独裁企图,呼吁维护“人民民主权利”。毛泽东在纪念中国共产党

成立 28 周年的文章中也提到,“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团结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稳步地走到目的地”<sup>[22]1481</sup>。人民民主的动员功能体现了话语的行动功能,话语不仅用于解释世界,还试图影响话语接受者对世界的看法,进而达到改变世界的目的。人民民主背后人人平等的价值理念有普遍的道德正当性,它能说服话语接受者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行动,为取得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民主话语表达充分反映了时代境况,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基于对革命形势的把握和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认识,不断调整民主革命依靠对象,以有效动员多数力量夺取革命胜利。因此,这一时期人民民主话语核心词围绕“建国”“抗日”“反蒋”“团结”“动员”等展开,其话语结构可总结为:目标上,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实现人民翻身作主,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策略上,依据革命形势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动态调整对民主的阶级基础的认识,以及对民主革命的依靠力量的认识,充分实现人民民主的动员功能。

### 3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人民民主话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改天换地的大事,“中国的历史进入一个完全新的时代——人民民主时代”<sup>[23]432</sup>。伴随新中国的成立,人民民主话语上升为国体表述,被写入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随后又被写入国家宪法,人民民主话语结构开始作出调整。新中国成立初期,鉴于新生政权地位未稳,国民党军队残余、阶级剥削压迫事实仍然存在,这就要求人民民主话语一方面继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内涵,具有革命、动员属性;另一方面又要回应新阶段新使命,人民民主话语要能体现人民主体地位,能促进社会主义建设。

一是巩固新生人民民主政权。政权的新生标志着新事物的诞生,但旧势力仍然存在,需要对其进行连根拔除才能促进新事物的成长。中国共产党对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以“巩固新社会秩序及保护人民合法权益”“保卫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sup>[24]451</sup>名义进行宣传,并将话语与行动结合起来,巩固新生政权。比如,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颁布《共同纲领》,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确保新政权运行有依托;继续追剿国民党军队残余,和平解放西藏,开展大规模剿匪斗争、镇压反革命运动,维护社会秩序;接收帝国主义在华资产,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归国家所有,逐步恢复和发展经济,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继续推进土地改革,采取“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路线;抗美援朝,确保我国发展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等<sup>[25]</sup>。因此思考新政权诞生时的人民民主话语,离不开对这些措施的叙述,人民民主话语为这些措施提供了行动正当性,这些措施则是人民民主话语的实践表达。

二是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同纲领》明确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地位,但迫于国内军事活动尚未结束,各项基本的政治社会改革工作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经济也需要一个恢复时期,人民代表大会并未立即召开。1953年时机成熟,中央政府开始筹备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关于这次会议召开的意义,毛泽东强调,“这是中国人民流血牺牲,为民主奋斗历数十年之久才得到的伟大胜利。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更加发扬人民民主,加强国家

建设”<sup>[26]</sup>。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确立到落实也体现了人民民主话语由抽象到具体的实践过程。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比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民主话语也发生了从权利诉求到权利践行的重大转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民主话语意在向专制者呐喊权力属于人民所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权力已经属于人民,人民开始选举人大代表,借助公共权力来治理国家,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行使权力来践行人民民主。

三是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要求消灭剥削、消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因此对国内仍然存在的资本主义要素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其成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要素的留存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策略有关。彼时,中国共产党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充分发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作用,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实现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但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本质就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了。事实上,在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时期,资本主义工商业虽然仍起到一定作用,但和社会主义经济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明显,以致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就转变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因此,只有实现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才能保证人民的主体地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认识更多探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相对忽视生产力问题。

四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国共产党推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大民主”。初心是清理党内腐败,确保政权性质不变色,但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社会有序发展。不过,“大民主”为中国后来的民主政治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比如要坚持党的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完善法治建设。我们要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来客观看待历史。正如习近平所说的,“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sup>[27]</sup><sup>112</sup>。随着社会发展步入正轨,“大民主”也被人民民主话语结构边缘化。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人民民主话语随着上一阶段目标的实现,自然不会再包括抗日反蒋、革命建国等议题,而是与时俱进、适应新政权建设。人民民主话语表达围绕巩固新政权、恢复发展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发展“大民主”等展开。换句话说,人民民主话语结构可总结为:目标上,巩固新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充分保障人民主体地位;策略上,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等,推进社会主义大民主。这些话语充分体现了新政权的主要工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 4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人民民主话语

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经验总结与反思,以及对当时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之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作出改革开放的伟

大决策。在民主政治建设上,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民主与集中的统一、民主与法治的统一,随着人民群众权利意识觉醒,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成为大势所趋。面对西方“和平演变”图谋、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时局,中国共产党强调建设中国式民主的重要性,最终确立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治国方针。

一是继承和发扬民主集中制。人民民主话语实践表达包含民主集中制。事实上,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它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确立。党的六大提出,“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的讨论和集体的决定主要问题;同时反对极端民主主义的倾向,因为这是可以破坏党的纪律”<sup>[28]395</sup>。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还曾提到“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sup>[29]485</sup>但因对政治发展和社会建设规律把握不够,这一传统在一段时间里没有得到很好地继承和发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主集中制成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原则,“没有充分的民主,就没有很好的集中,但不能搞无政府主义”<sup>[30]239</sup>。从鼓励争论、调动积极性的角度出发,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民主作用,认为民主集中制的中心是民主,要通过民主来促进思想解放,有效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释放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民主集中制成为人民民主话语的核心表达,它在人民民主话语结构中重要性的变迁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建设和发展的曲折探索。

二是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国家工作重心重新聚焦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回应。现代化建设要求有一个非常稳定的政治、社会局面,法治建设被提上日程。人民民主话语更加富有现代性和建设性。邓小平曾这样评价“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sup>[31]116</sup>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sup>[32]359</sup>民主与法治的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对人民民主话语的重要贡献,现实政治运行也越来越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这也深深影响了之后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建构,比如“三统一”的确立。“法治”也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新时代,中共中央还印发了《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法治实践被放到突出位置,“法治”充分融入人民民主话语中。

三是形成“三统一”治国方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显著特征,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人民民主话语的核心表达。“三统一”治国方针的产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面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以及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邓小平意识到了建设中国式民主的重要性,要求党员干部提高警惕,提防意识形态风险。随后,初步形成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中国民主政治模式。“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绝不能照搬西方的多党制,不能搞三权分立、两院制那一套。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处理好党的领导、发扬民主、依法办事的关系。党的领导是关键,发扬民主是

基础,依法办事是保证。”<sup>[33]343</sup>对法治的重视是基于过去经验的总结,只有实行法治,国家才有秩序;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前提,离开这一根本前提,国家会蜕化变质;人民当家作主则是国体表述,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内在要求。此后,“三统一”成为人民民主话语的核心表达,凡提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都会提到“三统一”。

四是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基层是离人民群众最近的地方,基层事务也是人民群众最了解、最为关切的议题,人民群众参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人民民主最真实的体现。邓小平曾提到,“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sup>[34]512</sup>。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权利意识逐渐觉醒,自我管理诉求日渐增加,加之,推进基层民主政治能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基层民主建设得到国家支持。向基层放权与发挥民主关联起来,“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在农村就是下放给农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sup>[31]252</sup>,“使人民有更多的民主权利,特别是要给基层、企业、乡村中的农民和其他居民以更多的自主权”<sup>[31]210</sup>。在群众自发和国家主导结合下,基层民主建设蓬勃发展。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sup>[35]30</sup>1998年还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试行限定,村民自治在全国范围内广泛铺开,村民参与政治生活“皆大欢喜”<sup>[36]303</sup>。由此可见,基层民主在人民民主话语中的重要地位,它成为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人民民主话语体现了建设属性,反映了中国现代化建设步入正轨。这一时期的人民民主话语核心词包括“民主集中制”“法治”“三统一”“基层民主”等。其结构可总结为:目标上,继续围绕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这是对上一历史时期的延续;策略上,基于对“大民主”的反思,为实现民主政治有序发展,更好推动社会建设,强调坚持民主与集中的统一、民主与法治的统一,并初步确立了“三统一”,伴随社会的发展,为更好调动和回应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 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人民民主话语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就人民民主话语而言,它继承和发展上一历史时期的话语表达,比如民主与集中的统一、民主与法治的统一、“三统一”等被保留下来,构成人民民主话语核心。同时为回应新时代的新矛盾,人民民主话语要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以民主促民生”<sup>[37]</sup>。

一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民主话语指向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不同,新时代的人民民主话语则是指向如何有效治理国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及时回应不断变化的世情、国情、党情,更好将“初心使命”转化为现实的需要。新时代,人民民主主要能有效地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全面脱贫,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迈进;要能使人民享受社会主义发展成果,确保人民群众能公平分配国家发展的“蛋糕”,彰显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能扩大人民政治参与,确保人民享有广泛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我们不仅要有成果民主,也要有过程民主;不仅要有实质民主,也要有程序

民主。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等已日臻完善后,实质民主要更上一个台阶。为此,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全力推进社会民生建设,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改革有效推进,腐败治理取得良好效果,而这些都是对人民期待的回应。还需高度重视的是,为更好治国理政,党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大还确立了未来30年国家发展的阶段目标等治国理政的顶层设计方案,为国家发展提供了指导。人民民主国家是一个物质丰富的、社会有序的、政治清廉的、人民生活自由的国家,是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二是发扬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sup>[38]</sup>协商民主的产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化、人民利益日益多样化,基层选举中出现的贿选问题,第三世界国家照搬西方民主模式所导致的国家衰败等,是协商民主得以铺开并上升为一种政治制度的背景。再者协商民主更符合人民心理期待,因为“多数中国人更愿意选择协商,而不是投票表决”<sup>[39]</sup><sup>68</sup>。协商民主是社会多元共治的表现,有利于找到改革的最大公约数,形成凝聚力,它是对选举民主的有效补充。习近平指出“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sup>[40]</sup><sup>293</sup>党的十八大以后,“协商民主”作为重要的民主政治实践被正式纳入人民民主话语体系。2015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形成了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协商等多种协商形式。“从党的十八大到十九大五年间,党中央召开或委托有关部门召开的协商会、座谈会、情况通报会共计110多次,其中习近平主持召开或出席的就有20多次。”<sup>[41]</sup><sup>400</sup>

三是走好线上线下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sup>[38]</sup><sup>66</sup>群众路线是革命胜利的保障,是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必然要求。新时代群众路线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只要我们深深扎根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就可以获得无穷的力量,风雨无阻,奋勇向前”<sup>[42]</sup>。新时代走好群众路线包括线下和线上,二者有效结合。线下群众路线,即领导干部要常态化推开门、走出去,下基层去考察调研,直接了解人民群众的愿望、诉求、意见、建议等,做到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同时还要打开门、迎进来,主动听取来自政府部门表达利益诉求的群众心声,让群众真切感受到政府是人民的公仆。就线上群众路线而言,即充分发挥互联网作用,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梳理人民群众关切事项,纳入决策考虑重点。习近平强调,要“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经常上网看看,潜潜水、聊聊天、发发声,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sup>[43]</sup>。政府部门还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情况通报等形式,及时回应民众关切的事。群众路线在新时代被高度重视与中国共产党不断强调党的“人民性”,以及互联网技术发展能更好推动国家治理有关,体现了党与时俱进、人民民主话语不断丰富完善的特征。

四是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人民民主话语在新时代的新表达,它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规律认识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的经验结晶。首先,全过程人民民主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性和优越性,体现了人民民主的实质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民主的形式是人民群众的广泛持续参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

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sup>[1]</sup>。其次,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新要求。“我们要继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治国理政的政策措施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工作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工作上来。”<sup>[1]</sup>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过程性与人民性的结合,它要求系统推进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各个环节,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真正实现人民民主的真谛。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标志着中国的人民民主迈向了新台阶。

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环境复杂多变,充满各种风险和挑战,中国共产党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任务艰巨。因此,人民民主话语要能准确回应这样的时代要求,核心指向必须是“可治理”的。人民民主话语表达围绕“治理现代化”“线上线下群众路线”“协商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展开。其结构可总结为:目标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策略上,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走好线上线下群众路线、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

## 6 结语

人民民主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追求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表达,它反映出人人平等、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和实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民主话语结构有不同的内容。这背后的动力是不同时期不同的历史任务,它为社会主要矛盾所决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受“三座大山”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中日民族矛盾决定,人民民主话语结构表现为如何更好动员群众支持革命以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由“三座大山”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向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人民民主话语表达呈现出过渡色彩,强调巩固新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社会主要矛盾未发生变化,人民民主话语继续围绕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展开,但在具体表达上,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突出强调坚持民主与集中、民主与法治的统一、探索中国式民主的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民主话语指向国家治理现代化,具体策略表达上包括发扬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走好线上线下群众路线、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

民主作为一个易被意识形态包裹的话语,它容易被曲解,转而变成作恶的武器。因此,当理解一个国家的民主时需要去掉意识形态的外衣,深入民主产生的土壤去分析它产生的历史语境,只有充分了解了它的过去和现在,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sup>[44]54</sup>如今,面对西方举起意识形态大旗、鼓吹西式民主时,我们需要坚持民主条件论、历史论,坚定中国式民主自信,从本国国情出发,在增量改革中不断发展完善我们的民主实践。步入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应时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领导民主政治建设实践,切实保障人民的主体地位,为世界民主政治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 [N].人民日报,2021-10-15.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中国的民主[N].人民日报,2021-12-05.
- [3] 刘山鹰.立宪者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1):135-145.
- [4] 佟德志.中国改革进程与民主话语体系的变迁[J].政治学研究,2018(1):23-34.
- [5] 杨光斌.中国民主:轨迹与走向(1978—2020)[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 [6] 张志明.从民主新路到依法治国[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
- [7] 张明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特征及实现逻辑[J].思想理论教育,2021(9):31-37.
- [8] 刘九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传统思想渊源[J].政治学研究,2021(4):18-26.
- [9] 汪仲启.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基层社会治理重构——以上海虹桥街道为对象[J].社会政策研究,2021(4):107-123.
- [10]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 [11] MANNHEIM K.Ideology and utopi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M].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1954.
- [12] 米歇尔·福柯.话语的秩序[G]//许宝强,袁伟.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 [13] 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M].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 [14] FREEDEN M.Ideolog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17] 孙中山文萃:下卷[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 [18]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9] 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21]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2]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3] 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 [2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 [26]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开会.通过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N].人民日报,1953-01-15.
- [2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5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 [3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31]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32]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3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江泽民思想年编(1989—2008)[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 [3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35] 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36] 凌志军.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 [37] 房宁,周少来.民主民生共促和谐发展的制度之路——杭州市“以民主促民生”战略的民主治理意义[J].政治学研究,2010(5):82-92.
- [38]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39] 张明澍.中国人想要什么样民主:中国“政治人”(2012)[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 [4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41] 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42] 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强调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 中国人民生活一定会一年比一年好[N].人民日报,2017-10-26.
- [43]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4-26.
- [4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 The Changes of the Discourse Structure of People's Democracy of the CPC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PENG Chong<sup>1</sup>, WANG Bingquan<sup>2</sup>

(1.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2.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People's democratic discourse is a series of language expressions propos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hich aims at realizing and maintaining the people's status as masters of the country. The discourse structure of people's democracy gives expression to the unity of goal and strategy, value and practice. And its internal evolution stems from different principal problems of society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nd historical missions. In the period of the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 goal of people's democratic discourse is to establish a country in which its people are the master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strategies are about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mobilization capability of people's democracy and dynamically adjusting the trusted revolutionary forces; In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 goal of people's democratic discourse is to consolidate the new state power and build socialism in China, and the strategies are about establishing the system of people's congress and promoting "big" democracy; In the new period of reform, opening 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the goal of people's democratic discourse is to continue exploring a right path for building socialism in China, and the strategies are about adhering to democratic centralism, the unity of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and developing democr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goal of people's democratic discourse is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the strategies are about carrying forward socialist deliberative democracy, following the online and offline mass line, and promoting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Grasp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discourse structure of people's democracy is conducive to understanding the difficult course of the CPC's struggle for democracy over the past century, the great connotations of democr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profound meaning of democracy as a common value of humanity.

**Key words:** people's democracy, democratic centralism, community-level democracy, deliberative democracy,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责任编辑:赵超

## 本期作者简介



徐勇，1955年生，湖北宜昌人，博士，华中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政治学部部长、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政治学会会长等，入选第二届荆楚社科名家（湖北省社会科学界最高学术荣誉）。主要从事中国政治与乡村治理研究，是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研究的开拓者之一，率先将实证调查方法引入政治学领域，形成了一个有特色的研究团队。倡导田野政治学研究，提出建设政治学的“田野学派”。主要著作有《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1992）、《中国农村村民自治》（1997、2018）、《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2003）、《现代国家、乡土社会与制度建构》（2009）、《国家治理的中国底色与路径》（2018）、《乡村治理的中国根基与变迁》（2018）、《国家化、农民性与乡村整合》（2019）、《关系中的国家》（第1卷，2019）、《关系中的国家》（第2卷，2020）。



王炳权，1972年生，黑龙江鸡西人，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政治学研究》编辑部主任、副主编，中国政治学会青年工作专业委员会会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民主政治建设、政治思潮。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开设“政治学理论前沿”等研究生课程。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论述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治思潮的演进及社会影响研究”等。出版《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研究》《论民族主义思潮》等专著，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高校社会科学》《学术月刊》《社会科学研究》《行政论坛》《探索》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

